

◆“历史上的繁星”系列之一百一十

■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中)

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发展和壮大,直接促进、带动了中共商丘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在永城,游击支队帮助中共永城县县委和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在睢杞太,游击支队开辟睢杞太抗日游击区,帮助建立睢杞太抗敌自卫总团;游击支还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与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建立了统战关系,使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永城抗日民主政权建立

建于抗战初期的中共永城工委,在永城沦陷后停止了活动。为开辟永城中心区,1939年2月,游击进驻永城三区书店后,一方面协助国民党永城抗日县政府派游击队周周围日伪据点和汉奸土匪武装,一方面发展中共永城地方党组织。

1939年3月上旬,游击支队首先恢复建立了永城一区区委,接着相继成立了二区、三区、四区和五区区委。在此基础上,游击支队于1939年4月正式成立了中共永城县县委,游击支队派部队干部寿松涛任县委书记,盛税堂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先舟任宣传部长。

寿松涛是浙江诸暨县人,1900年11月出生,1926年1月入党,1938年在陕北抗大学习后,受党中央和河南省委的派遣,随彭雪枫进军豫东,在国民党永城县县长蔡洪范部做统战工作,任中共派驻蔡部的正式代表。国民党永城县政府瓦解后,彭雪枫为加强中共永城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便派寿松涛主持永城县县委的工作。

中共永城县县委成立后,又建立了六区委,并大力发展基层党组织,清除不纯分子,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建立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6月10日,共产党领导的皖苏边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永城县政

睢杞太抗日游击区的开辟

睢杞太地区,在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后开辟抗日游击区,睢杞太地方党组织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有力地配合了中心区根据地的开辟。

1939年1月,中共豫东特委跟随游击支队东进,为了坚持睢杞太地区的斗争,留下了支队参谋王介夫与当地党组织一起领导睢杞太地区的抗日斗争。1939年2月2日,睢杞太抗敌自卫总团成立,总团长是孟紫垣,副团长是王介夫。睢杞太各地先后建立了22个分团,其中睢县有长岗、王行、线张、船李、姬房李、岳庄、潮庄等分团,使睢杞太地区的抗日游击战成为群众性的全民抗战。其后,吴芝圃率部回睢杞太,与杨得志率领的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和从延安来豫皖苏工作的干部会合后,与抗战自卫总团一起纵横睢杞太地区,扫荡日伪顽匪,开辟了以睢县潮庄、太康龙曲和杞县板木集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区。

1939年4月睢杞太特委建立,马庆华任书记,下辖睢县、杞县、太康、民权四县工委,并领导淮阳、通许

府成立,县长由徐风笑担任。此后,永城又相继成立了6个区政府、区大队,35个乡政府和乡队。

为了给中心区的开辟提供经济支撑、保证部队供应,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永城县县委、县政府努力开展战时经济工作,增产节约,广开财源,筹粮筹款,发行钱币。1939年7月,永城县政府在边区率先印制发行“永城县流通券”12万元,作为全边区的法币正式使用,抵制了伪钞的流入。其后又发行30万元,以满足公私货物流通的需要。一直到1940年秋,边区印发“抗币”后,流通券才停止使用。

中共永城县县委、县政府在发展战时经济的同时,十分注重文化教育事业。1939年10月,县委以《拂晓报》为榜样,创办了边区第一家县报——《永光报》。此后,又组建了20余人的永光剧团,在全县各区轮流演出。在教育上,县委、县政府除了协助游击支队在永城举办随营学校、抗大四分校和抗日联中外,在已建立区乡抗日政权的中心区,恢复了沦陷后停办的小学校;在游击区开办敌来放学、敌走上课的“游击学校”;在农村青壮年民兵中,举办冬学识字班,很好地配合了抗日宣传工作。

等县的工作。同时,还成立了睢杞独立大队,马庆华兼大队长和政委。同年7月,睢杞独立大队与睢杞太抗敌自卫总团合并,成立了睢杞太独立大队,马庆华任政委,冯警宇任大队长。

马庆华是回族,1914年生于河北廊坊,1937年10月入党,1938年2月任中共杞县中心县委委员,一直在睢杞太地区坚持和领导武装抗日斗争。马庆华任中共杞太特委书记后,曾率领睢杞太军民,频频打击敌人,努力粉碎日伪的经济封锁和一次次“大扫荡”。不幸的是,他在1939年8月与日军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

马庆华牺牲后,睢杞太地区的工作曾一度陷入被动局面。为扭转时局,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派张先舟负责睢杞太特委的工作,并兼睢杞太独立大队政委,任命冯胜为独立大队大队长。他们到达睢杞太后,领导睢杞太军民接连打了几个胜仗,重新振奋了士气。

在永南涡北中心区和睢杞太抗日游击区开辟之

际,商丘所辖之永北、夏邑、虞城、民权一带,在苏鲁豫支队和冀鲁豫支队的帮助下,也恢复建立了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其中,苏鲁豫支队七大队开辟的夏永碭等陇海铁路南地区党组织、政权及部分武装,于1939年11月移交新四军游击支队和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管辖,成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苏鲁豫支队开辟的单(县)、虞(城)边地区即现在虞城陇海铁路北地区,成为湖西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冀鲁豫支队开辟的民(权)、曹(县)、商(丘)、兰(封)、考(城)边地区,成为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

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1939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来到新四军暂编第六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涡阳新兴集视察。

新兴集又称龙奶庙,位于安徽省涡阳县北部,与永城县南部接壤。1939年9月6日,游击司令部由永南书店案店移驻于此。而新四军暂编第六支队即是之前的新四军游击支队。1939年11月2日,游击支队更名为新四军暂编第六支队。1940年2月1日正式公布番号为新四军第六支队。1940年6月彭雪枫所率六支队与黄克诚南下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7月黄克诚率部东进后,四纵进行了重新整编。1941年2月,四纵改番号为新四军第四师。

刘少奇到达新兴集后,顾不上休息,便认真听取了彭雪枫、吴芝圃等人的工作汇报。刘少奇听后高兴地说,支队的发展和游击区的扩大,证明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进军敌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了毛主席说的在平原地区开展抗日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天,十月革命节,刘少奇参加了游击支队纪念十月革命大会,检阅了部队,并作了重要讲话。接着,他又召开了军队和地方县团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在敌后建立政权的指示。在讲话中,对于为什么建立政权和怎样建立政权作了详细阐述。刘少奇的一系列指示,给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他视察离开后,六支队和豫皖苏边区党委进行了认真的贯彻落实。彭雪枫、吴芝圃、刘瑞龙(留豫皖苏任区党委副书记)等拟定了地方工作要点,决定先在永城进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实行合理负担的试点,之后总结经验全面推广。并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帮助根据地各县建立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自下而上普遍建立农抗会、妇救会、青抗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大力加强地方工作。为减轻边区人民负担,繁荣边区经济,还在新兴集一带开设了工厂、医院、商店和其他服务性行业。

六支队和豫皖苏边区党委遵照刘少奇的指示,进一步加强边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充实健全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召开了边区各界人士代表大会,成立了边区政权的最高领导机构——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以及边区参议会、宪政促进会等统战组织。至此,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基本完成了开创工作。边区下辖睢杞太特委,路南地委,涡浍地委,皖北特委,皖东北工委,领导萧县、永城、夏邑、宿县等4个县政府,及怀蒙、怀凤、宿南、亳北、涡北5个办事处和睢杞太抗日游击区的部分基层政权。抗日根据地由开辟、初建,进入了稳定、建设和发展时期。

(市委党史研究室为采访提供帮助)

力尽筋疲

“力尽筋疲”又称“筋疲力尽”。我们在自己或别人做什么事情累得极度疲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的时候,总会用这一成语来形容。典故出自南宋初年丞相李纲的《病牛》诗。

李纲,字伯纪,两宋之际抗金名臣,民族英雄。宋徽宗政和二年进士,历官至太常少卿。宋钦宗时授兵部侍郎、尚书右丞。李纲任京城四壁守御使时,金兵入侵汴京。李纲团结军民,多次击退金兵,为北宋立下很大功劳,但却遭到投降派的排斥与诬陷,被罢去官职。宋钦宗在被金人所俘前夕又想起用李纲,任命他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但已无济于事。当李纲在长沙得知此命时,北宋已经灭亡。

后来,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今商丘)登基,建立南宋,是为宋高宗,召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让李纲速来南京就任。

李纲任丞相后,一心打败金兵,迎回被金兵掳走的宋徽宗和宋钦宗,恢复宋朝。他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煞费苦心,为高宗赵构谋划,向赵构上“十策”,虽然没被赵构完全采用,但使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混乱状况急速好转,宋朝中兴初现希望。

连载

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刘秀森

当时,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激烈。李纲对金人一力主战,置身于两派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赵构有两个最要好的人:黄潜善、汪伯彦。黄、汪是铁杆主和派,且有一力主和的张浚等一伙人。李纲为人耿直,与他们进行坚决斗争,因此结下仇怨。黄潜善、汪伯彦等竭力主张向金人割地求和,建议把黄河以北的土地割给金人。李纲坚决反对,并慷慨陈词:“祖宗疆土,应当死守,一尺一寸都不能让给敌人!”针对北宋以来军政腐败,李纲颁布新军制二十一条,整顿军政,在沿江、沿淮、沿河建置帅府,实行纵深防御,并亲自率兵收复失地。主和派却对他鸡蛋里挑骨头,千方百计诬陷他。昏庸的赵构最后听了主和派的话。结果,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十八日,李纲被罢职。

李纲在南宋首都——应天府南京主政仅七十五天。被罢职后,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所做的军事防御设施全被撤除,他所任的将帅也被撤职。李纲好不容易使之转好的抗金

形势从此急转而下。最终的结果是,金人趁势加强南侵,黄潜善、汪伯彦等人不主张抵抗,掙掙赵构南逃,赵构于当年十月初一离开商丘,向南逃跑,宋朝恢复的希望破灭。宋人诗中李纲评价说:“道数中兴相,公居第一人”,“整顿乾坤第一人,堂堂真相足仪型”,“材大古难用,功多忌更多;忠怀冲日月,谗口肆风波”。(《梁溪全集》附录张致远、陈公辅、曾开挽诗)

李纲罢职之后,投降派又将更多的污水泼在他身上。李纲《建炎进退志》说,在他罢职后,主和派“又言余倾家货以犒叛卒,为罪数千顶与之,遣弟迎贼,阴与之通,朝廷不复究问其实,有旨落职,令鄂州居住。谗谤如此,自非上恩保全,有以照见其无他,虽欲处江湖之善地,岂可得也?闻命即由江东西以抵武昌,适江上盗贼纷扰,权寓居于属邑之崇阳僧舍中。暇日,阅建炎初备位宰司日记,追思以迂拙甚陋之姿,荷上知遇,付以国事,当轴秉钧才七十有五,竟以谗罢。曾无涓埃

之补,而罪衅之积有逾丘山,尚窃禄俸饱食而逸居,惭赧深矣。然余既罢之后,张所亦以罪去,傅亮辞以母病,不赴行在而归陕西,招抚经制司皆废。车驾遂东巡,而两河郡县皆陷于贼,金人以次年春掠京东西,深入关辅,残破尤甚,此岂人力也哉。”

李纲为宋朝的命运慨叹,但自己已无能为力。想起自己为宋朝像老牛一样倾尽心力,最后只落下因操劳过度而多病的身体,追忆在南京的日子,便写下《病牛》一诗,采用拟人手法表达自己的抱负和心情:“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卧卧残阳。”大意是:牛为主人辛勤耕耘了千百亩田地,主人粮食满仓,可是又有谁对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的老牛表示同情和哀怜呢?只要大众百姓都能吃饱饭,哪怕累得爬不起来也心甘情愿。“力尽筋疲”本来是李纲引用唐代韩愈《论淮西事宜状》中语,而由于李纲的这首诗不但让当时的人们感动,也让后来的人们感动,影响力极大,后来人们就用“力尽筋疲”来形容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力尽筋疲”才成了成语。

例句:清代李渔《奈何天·筹饷》:“糠粃粮,我这里力尽筋疲,舌敝唇焦,并不见些儿响。”刘大白《驾犁》诗:“驾犁,驾犁!老农歇气!拉牛耕田,力尽筋疲。”(26)

